

II 历史风云

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与话风文风

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及其传达力度,反映着其内在世界所达到的境界,牵连出对事物的洞见程度。毛泽东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很有个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著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说他是语言大师,当不为过。

最近,读到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颇有建树。该书仿佛画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引导读者去打开毛泽东思维和思想的“百宝箱”,进而勾起人们对现代中国话风文风的万般思绪。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却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心迹,在他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还极而言之说,这样的语言表达“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然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文件和文章表达也形成相应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毛泽东又头痛起来。1958年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毛泽东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具体典型,就很厉害地给以敲打。1958年9月初,他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14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我谈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遍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词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毛泽东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因为他自己就拥有浑然天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创造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诸如“球籍”“指点江山”“只争朝夕”“糖衣炮弹”“朝气蓬勃”“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些词语,虽非毛泽东原创,却是经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成为流行语的。诸如“班长”“纸老虎”“牵牛鼻子”“实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枪杆子、笔杆子”,“东风、西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这些词语,由于被放置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新的语境,做了新的解释,陡然有了新的内涵,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以“纸老虎”为例,这个说法民间早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也有人使用过,但它能够流行中国乃至世界,甚至成为一个英语词汇,毫无疑问缘自毛泽东1946年8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创造化用如此众多且影响广泛持久的“魅力词语”的

人,无出其右。而且,这不只是与毛泽东特殊的政治影响力有关,确实是因为这些词语体现了他要求的语言“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功夫下得最深的,是考证毛泽东创造化用的词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新意所在。比如,书中梳理了毛泽东创造“朝气蓬勃”一词的过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对抗大学员的演讲中提出,“要有朝气,就是要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这是“朝气蓬勃”一词的最初形态;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讲,“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朝气蓬勃”一词的诞生之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留学生们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朝气蓬勃”流行中国成为时代语汇之始。如此振叶寻根,观澜索源,谈来有趣,也算一家之言。

毛泽东的语言创造,还包括对典籍或民间词语的化用生奇。除了“实事求是”“愚公移山”“鱼水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曾经沉睡的词语,经毛泽东夺胎换骨、旧瓶新酒的发挥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还有一些看起来寻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实则意味深长新意迭出的词语,被毛泽东“拎”了出来,作新的发挥运用。诸如把领导干部比作“勤务员”,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把向实践学习比作上“劳动大学”,把思想顽固比作“花岗岩脑袋”,把文武结合比作“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调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这些词语,我们习以为常,以为本来如此,或者“知声不知音,弹弦不弹意”,若考其来历,便知毛泽东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功所在。

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提倡改变话风文风,反对长话、空话、假话,要求讲短话、实话、新话。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率先垂范,“中国梦”“讲规矩”“软骨病”“敢于亮剑”“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式”“不惹事,不怕事”,这些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治国理政词语,不断吹来清新之风。同时也说明,话风文风固然可以抓出来、促出来,但前提是对事物,对时代,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和概括。为此,回头看看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也就不是多余之举了。

(摘自《党的文献》陈晋/文)

II 人物风云

谷牧主持腾退修复恭王府

谁的孩子谁抱走

经过十年动乱,恭王府已成为被八家单位割据、数百住户聚居的大杂院。其中主要有文化部所辖的中国音乐学院及其附中、文学艺术研究院,公安部的宿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国管局)的幼儿园,以及北京市所属的北京风机厂。谷牧为此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召开联席会议。修复恭王府,首要任务是搬迁,工程面临着怎么搬、谁来拿钱搬的问题。1980年7月19日,谷牧视察恭王府。在后花园检查原王府大戏楼的保护情况时,以温和闻名的谷牧撂下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出去。”他还为恭王府搬迁定下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1981年9月,谷牧召开恭王府搬迁会议,搬迁工作终于启动。

把不愿搬走的老红军叫到国务院谈话

1982年春节前后,修建队向文化部提交了恭王府调研报告,提出了后花园24景的修复方案。4月,文化部修建队匆匆入驻恭王府,当时府邸里住了200余户,花园中心区域住了60户,周边40多户。原王府的古建已濒临支离破碎的边缘。

各单位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为此,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大会小会开了几十次,谷牧也多次来视察,还下了“限时限刻”搬出的命令。首先从花园搬走的是文学艺术研究院下属的红楼梦研究所和国

管局幼儿园。

1984年,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强势要求下,北京风机厂也于限定日期内搬迁完毕。

为了迁走恭王府的住户,公安部下了很大力气,统建宿舍,还成立了公安部大观园宿舍拆迁办。住在花园中心的一位公安部老干部是老红军,不愿搬迁。最后还是谷牧把老红军叫到国务院谈话,才得以解决。

恭王府中有文化部的两大单位: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研究院1982年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管局与北京风机厂搬出后,文化部就成了恭王府里最大的占房户。艺研院所属的红楼梦研究所原在花园里办公,府邸里的艺研院尚未整体动迁,先搬出来的红楼梦研究所无处可去,索性搬出花园,又进府邸。

此举让谷牧发了火:“文化部再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公安部搬出来,你们搬进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文化部副部长宋木文当场表示:“谁再搬进去,谷牧同志拿我是问!”

三代国务院领导人接力终于画上句号

1988年,谷牧卸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他任职期间,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和修缮基本完成。当年8月17日,恭王府后花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但因缺少经费,后花园的修缮并没有全部完成。

1989年,李瑞环到恭王府视察。为了能让恭王府花园在来年的亚运会期间成为接待定点单位,经他批示,从亚运会的预算里批了150万的专项经费给文化部。赶在1990年亚运会开幕之前,恭王府后花园的修缮工程终于全部完成。

而恭王府府邸部分的搬迁由于牵扯面太广,问题太复杂,几乎无法向前推进。1995年4月22日,退休的谷牧再次来到恭王府考察。恭王府负责人向他保证,应能在1997年完成大部分单位的搬迁工作,但他已经不太相信这样的保证了,只留下一句:“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1999年,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岚清开始主持恭王府的腾退修复工作。他后来回忆:“谷牧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迁往北四环新址;2006年10月,占据恭王府府邸的最后一家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出。在三代国务院领导人的关心下,历时28年的恭王府腾退工作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2008年8月20日,大修后的恭王府府邸对外开放。2009年11月6日,谷牧病逝,他看到了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何曦宇/文)

《阎明复回忆录》中有一个细节,说他初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积累汇编的毛泽东常用词语、词组和成语,一共三大本,送给翻译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做翻译时有所准备。回忆录中写到:“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1975年,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向谷牧托付了三项文化建设工作:建立北京图书馆新址、重整琉璃厂老街和修复恭王府。“四人帮”垮台后,谷牧开始正式进行这几项工作的筹备,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李先念等领导的支持。